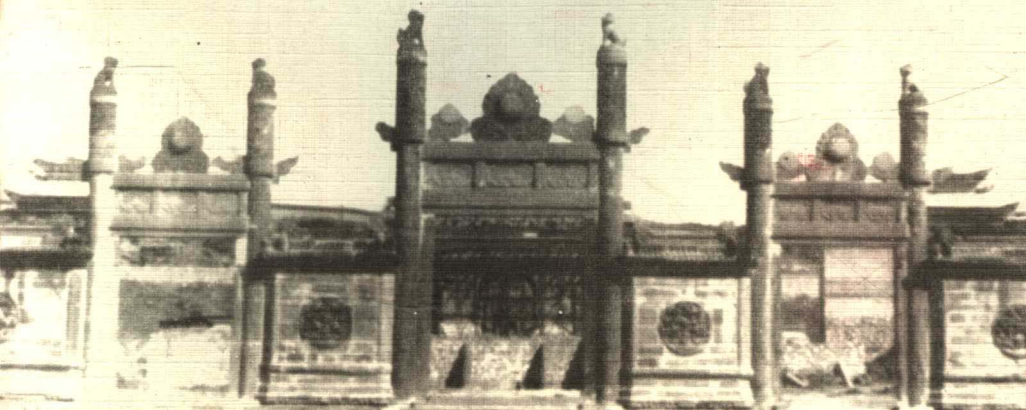


1702
第七辑

丹江口文史资料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DIQIJI DANJIANGKOU WNESHI ZILIAO
DANJIANGKOU SHI ZHENGXIE
WENSHI ZILIAO WEIYUANHUI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五年三月

主 编/潘耀合

责任编辑/曹仲明

校 对/陈桂华

魏正东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丹江口文史资料（第七辑）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湖北省丹江口市沙陀营路 158 号
邮编：442700

开 本/850×1168mm 1/32
字 数/190 千
印 张/10.5
纸 型/60 克书刊纸

2005 年 3 月出版
南阳市彩印厂印刷
DW1 -7
鄂十内图准字（2005）009 号
工本费/15.00 元

目 录

刘毓兰	1 我记忆中的陈少敏大姐
顾明德	13 刘毓兰在汉口
张郁兰	19 相濡以沫六十秋
李宗仁	42 振军鄂西北
张一鸣	51 李宗仁在均县二三事
林英纯	56 “山东联合中学”在均县
崔力明	67 抗日初期的国立湖北中学
吕西凡	72 “醒华”剧团的成立及活动
白 峡	75 告别均县
程 达	78 抗日时期的武当小学
涂永珍	81 我所知道的净乐宫复建
王永成	85 我印象最深的三处古建筑

牛孝文	91 对均州城的记忆
张华鹏	109 均州城怀古
张华鹏	140 回忆土桥的土地改革
刘祥纶	145 对初建公安工作的回忆
马平飞	152 建国初期的均县公安工作
陈永兴	157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几件事
童德伦	170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两件事
杨芳展	174 忆邓小平视察丹江口大坝
刘铁军	177 李先念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
朱道琼	184 我陪张德勤视察武当山
徐建明	190 《金顶春晓》小型张设计忆想
叶 菁 高 伟	193 武当山特种邮票申报经过
陈 楠	196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纪念》小型张的构想
赵洲美 高 瑾	198 一枚邮票的“原地”之争
李永燕 李 莉	

王经国	202 《被新闻记录的历史》序
曹仲明	205 见证朝鲜战争的刘荣桦
潘耀合	208 《丹江口日报》停办前后
曹仲明	212 忆《丹江口文史资料》的经费来源
萧绍芬	214 忆先父萧萱的手枪
张业汉	217 在兄弟民族地区工作五十年
蔡文 蔡起亮	229 王光德仙逝周年祭
周国印	
张之航	234 吕振万先生轶事
余良瑛	239 闽南三日见闻
谭大江 杨群力	244 武当武术在台湾
郑世杰	248 访爱新觉罗·溥儁先生
朱道琼	251 爱新觉罗·溥儁武当访问记
陈尚海	258 沃渣送我《喂猪图》
卢述华	261 “文化大革命”中的抢枪事件
熊孟弼	285 对五·七干校生活的回忆

- | | |
|---------|------------------|
| 沈均奕 | 290 同治年间的自然灾害 |
| 彭正林 | 294 见闻均县麻风病院 |
| 蔡占德 | 306 对梅毒头癣查治工作的回忆 |
| 余良瑛 | 312 闲话丹江口大坝初建时 |
| 李 才 | 315 难忘三线建设的那段生活 |
| 黑 皓 卜昌学 | 320 农夫山泉落户丹江口前后 |

我记忆中的陈少敏大姐

刘毓兰

—

1966年，一场历时十年的动乱开始了。它搅乱了一切，也搅乱了我们的生活。十年间，我的家庭也历经沧桑，但最使我难忘的是与陈少敏大姐在危难中的一段交往。

陈大姐是我在鄂豫边区时认识的首长，在工作上我曾受过她亲切的教诲。她在整个边区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曾使日伪敌军、反共土顽闻之胆颤心惊，咬牙切齿。

“文革”开始不久，我就风闻陈大姐在全国总工会受到了冲击。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出像陈大姐这样一位一身清白、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牺牲了个人一切的钢铁战士，竟也难逃这场浩劫，更想不到她在“文革”浩劫中竟被折磨成那个样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相信哩！

1967年1月，我爱人王锡珍因患食道癌在日坛医院手术后转北京医院治疗。一天晚饭后，我从病房出来送碗筷，看到一位老人一手扶着墙，一手拿着饭碗朝送饭车艰难地移

步，我赶快走到老人面前帮忙。当我接过她手上的饭碗时，猛然听到她说：“哦，是小刘呀，你怎么在这里?!”我一下楞住了……怎么？眼前这位颤颤巍巍的老人，难道就是陈大姐？我那英姿飒爽的大姐哪儿去了？我满心凄惶，哀痛地问：“大姐，您怎么了？”我见她行步艰难，忙把她搀进病房，扶上病床并告诉她，王锡珍因患癌症开刀住在隔壁。她马上说：“我去看看他”，说着就要从床上下来，我忙按住大姐说：“您别动，我去扶他来看您。”她仍执意要去，我好歹说服了她，忙将锡珍扶到大姐床边问候，想宽宽她的心，未料俩人都放声哭了起来。当时我的心都快碎了，却又惴惴不安，惊恐万分。我担心大姐心脏病复发，刚手术的锡珍体力难支，又怕被旁人看见而招灾惹祸。当时我虽心急如焚，却只好强忍悲痛，劝他们安静下来，千万别激动。

二

当晚回到家中，我怎么也睡不着，往事如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第一次见到陈大姐是在烽火连天的1940年。那年2月，我们五个青年学生在王锡珍（当时化名陈约珥）同志带领下，由鄂南咸宁——我们战斗过的家乡，通过敌占区和几道封锁线，辗转来到豫鄂边区。我先到湖区新四军五师四团队工作了一个时期，那时就听说陈大姐许多故事，很想马上见到这位神奇的人物。约3月间我们来到京山八字门边区党校学习。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陈少敏大姐。

那是到党校开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陈大姐要来给我们

做报告，我当时听了欢喜得心花怒放。谁知报告都听完了，大姐还没来。我心中疑惑，便问其他同志，“不是说陈大姐来做报告吗？”大家听罢哈哈大笑，问我：“刚才你听了半天报告，谁讲的啊？”那时我年龄最小，信口就说：“陈大姐是女的，怎么刚才做报告是男的？”经同志们解释后才知道，平时大姐装束打扮就和男同志一样。只可惜我当时只顾埋头记录，也没仔细看清大姐的模样。在我原来想象中，只觉得她是一员威武的女将，没想到她却是那么亲切、质朴，而且语言犀利、谈笑风生。

4月，我们党校随区党委、司令部出发到湖北黄陂，长途行军好几天。一路上，抗日歌声此起彼伏，远远地看到陈大姐威风凛凛地骑着高头大马，总是给我一种无形的力量。到黄陂黄家畈住下后，开欢庆大会，不想这次我正好坐在大姐旁边，只见她意气风发，精神抖擞，活跃地参加啦啦队，喊着：“师长，来一个！”在这里“师长”指的是当时任新四军五师师长的李先念同志，李师长也要大姐来一个！这种热闹非凡、振奋人心的场面，我还从未见过。真正体现了我党我军上下一致、官兵同心的作风。在当时那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大家仍然那么乐观，这种情形，真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我陶醉在欢乐的人群中，心想：“这次我要把大姐看个够”。大姐看我总盯着她，亲切地用手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了一声：“这小鬼”！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洗礼，也是第一次见到陈大姐那活泼热情、和蔼可亲性格的一面。

这年夏秋之交，党校将我分配到边区党委组织部。我到组织部报到后，工作了一段时间，组织上又决定派我到武汉

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临行前，大姐亲自对我说：“这是党交给你的特殊任务，担子重，责任大，工作极其艰难，要有思想准备。你是学生，到了汉口还是上学，以此身份作为掩护，将汉口散落的地下党员联络起来，建立党组织，你任支书，稍后组织派人来找你。”带着大姐的指示，我到汉口考上了圣若瑟女中并按照大姐的交待，建立了党支部。1941年冬，王锡珍同志被委任为汉口特别市委书记，他到汉口按原来约定的地点找到了我。

1942年初，王锡珍同志返回大悟山向陈少敏大姐汇报工作。大姐突然问：“你结婚了吗？”王奇怪地反问：“我跟谁结婚？”陈大姐哈哈大笑说：“你这傻瓜！你身边有那么一位好姑娘小刘，你不会找她结婚？回去后就告诉她，‘大姐让你和我结婚！’”锡珍道：“她还是个小姑娘，我怎么开口？”大姐指指随王一起去边区的汉口地下党机要交通钱道权同志说：“你回去对小刘说，为了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她和陈约珥结婚（大姐一直叫他陈约珥，很少称他王锡珍）。”他们在边区休整、学习数日后，即返汉口。这年春天，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也为了让锡珍能够安全、稳定地在汉口扎住脚跟，我们遵照大姐的意愿结为夫妻，共同周旋在敌占区，成为并肩战斗的挚友和伴侣，而我的一生也和大姐连在了一起。

1943年，我随王锡珍奉命调回边区，参加整风审干学习。回来的第二天，我就见到了大姐。以前我每次见到她，总感到分外亲切，信心倍增，似乎像见亲人一样，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她每次见到我，也总是喜欢开玩笑，比如说：“嘿！哪儿来这么个电影明星啊！”这次大姐见到我，只是很关切地对我说：“小刘，你瘦了”，紧接着又说：“我养了一

只母羊，你每天来我这儿挤杯羊奶给你的小孩子吃，你可少喂自己的奶。”那是上级为了照顾大姐身体而特批给她的待遇，她却先想到我。我听了之后，眼睛湿润了，一股暖流顿时浸透全身。当时形势相当严峻，大姐肩负着重任，显得那么威严，可她仍不忘对同志的关心。对于大姐，平时大家对她很有些敬畏，我自己开始与她接触时也总是十分拘束，甚至害怕她，经过多次来往，不仅不再感到她“厉害”，反而觉得每次与她交谈，就准能得到无穷的力量和慰藉。

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边区环境更为险恶。1946年，经组织决定，我们夫妇从宣化店化装突围，转移到华东解放区去寻找党组织。当我们到南京后，锡珍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钱瑛大姐接待了他。钱大姐说：“早就知道你们来了。由于工作需要，组织决定，将你们夫妇留在南京。”自此，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们一直战斗在南京、上海，从事党分配的各项任务，直到上海解放。这期间，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大姐。

1951年，陈大姐由北京出差到上海，住在金门饭店。不知她从何处得到我家的电话号码，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一拿起电话，听到对方问：“小刘吗？”声音相当熟悉，可一时又想不起是谁，便询问：“您是……”对方又说：“我是大姐！”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禁又问：“是谁？”大姐又说：“我是陈少敏。”我惊喜地喊到：“大姐，您在哪儿？”她说：“我住在金门饭店，陈约珥在家吗？快告诉我你家地址，我来看你们。”我高兴地跳起来，叫老王快来接大姐的电话，然后我们马上去金门饭店。想不到几年不见的大姐，身体倒比过去好多了。她显得精神抖擞，满面春风，很动情

地说：“真想你们，见到你们，我好高兴呀！”话没说几句，她又开起玩笑来了：“小刘，你还是那么漂亮！”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经历多年战争硝烟的大姐，还是那么亲切，那么豪气，那么幽默。

1955年，我们夫妇一调回北京就去看望大姐。后来由于平时工作忙，老王又被派到香港工作，我孩子又多，来往就少了。有时在会场相遇，快快乐乐地打个招呼，问声好，就分手了，难得在一起交谈。没想到“文革”中又在医院与大姐不期而遇，看到她那种情况，我心里非常难过。从此，我天天去照顾大姐，我的儿女们也常常去看望，为她买东西，从家里带鸡汤之类的菜肴给她补养身体。

三

1967年夏，江青、康生一伙声称，又揪出了一个以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为首的“大叛徒集团”，将已经被毛主席所肯定与高度评价过的、党内早有决议的“中原突围”污蔑为“叛变”。在他们的煽惑下，来了一群造反派，要当过原中原局组织部长的陈大姐去中山公园陪斗（据说主要是斗原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同志）。医生说，陈少敏心脏病严重，不能去。造反派说，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揪陈少敏去陪斗。医生再三叮嘱：时间不能长。我站在一旁，眼看着大姐被这群人挟持而去，想着她此去凶多吉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和郁闷。我回病房后告诉了锡珍，他也非常难受，一心惦念着大姐，再三询问大姐的情况。我一次次地到大姐病房门口张望，盼她早些回来。终于等到大姐回来，我赶快到

她房间问候。当时医生正给她输氧，我见她要喝水，就喂了她几口水，然后又去告诉锡珍，大姐已平安回来，叫他放心。后来大姐对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们像耍猴一样，把我押到台上，高喊：‘将大叛徒陈少敏押出来示众’……”听到大姐遭受如此折磨，我心中宛如刀割。当时我的儿子们听说王震同志敢于出面为老干部说话，而王震正好又是那时中原局的领导人之一，因此我们动员大姐给王震同志写信，向中央反映自己的处境。我的大儿子王海治帮她写好了材料，又与二儿子王宏治一道将材料送到王震同志家中，亲手交给了他。王震还向他们兄弟俩详细地了解陈大姐当前的情况，第二天他就到医院去看望大姐并及时地将大姐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在周总理的干预下，大姐的处境终于得到了改善。

不久，医生说锡珍可出院回家休养，我告诉了大姐。她很难受地要我将电话号码留下，要我儿子们经常去看她，帮她整理材料。这中间大姐不断地来电话询问锡珍的情况。1968年元旦，王锡珍同志逝世。我到医院去看大姐，告诉她：锡珍已经走了。她沉思良久，流着泪对我说：“小刘，坚强些！你的孩子好，有出息。目前你有困难，我帮你。”我非常感谢大姐的深情厚谊，从中得到很大安慰，但是我怎么忍心再给大姐添麻烦呀，她自己已经很难了。后来，北京医院也被“砸烂”，大姐被迫出院。随后，批斗与折磨使她的右肩关节脱臼，半身不遂，后来腿也摔坏了，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那时我听说北京前门附近有个解放军门诊部，能做快速针疗，就专程去访问了几个求医的人，都说效果不错。我连忙到宣武门内陈大姐家，向她秉明情况，看她是否

愿意到那儿求医。没等我说完，她就焦急地要我想办法带她去诊疗。我叫来一辆三轮车，让大姐坐在车上，因三轮车太小，位子上只能坐一个人，就让我的小女儿王炼冶陪坐在她脚下，扶持着异常衰弱的大姐，我自己则先到门诊部等候大姐。每次到了门诊部时，炼冶的腿部麻得站不起来。就这样，我们陪大姐针灸了约一个来月。

四

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大姐开会去了。当时我还天真地想，能让她参加十二中全会，大姐可能过关了，她的病肯定也能得到治疗了。会后，我立即去看望大姐。她一见到我就笑个不停，我都给惊呆了，以为大姐的病加重了。我一个劲儿地叫：“大姐！大姐！”她一个劲儿地笑，竟笑出泪来，并说：“康生骂我了！”我马上感到大祸临头了，忙催促她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认真地说：“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我没举手。康生非常恼怒，向我呵斥：‘陈少敏，你干什么！为什么不举手？’”我问大姐，“那你后来举手了没有？”大姐非常坚定地说：“我没有！”说罢她竟然又笑了起来。那时我们还未听到传达文件，不知究竟怎么回事。我问大姐：“刘少奇到底有什么罪名？”大姐的笑声戛然而止，严肃地问我：“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你相信吗？”我见大姐神态不寻常，旁边又有个保姆，就默然不语了。大姐知我内心不平，就摸着我的手，陷入沉思。保姆同情地说：“人家又整她了，她还笑！那天军代表叫她去听传达会议精神。她去了，又称‘少奇同志’，被人家批判了一顿。”这一说，我的

心情更是沉重，可不知为何她却又笑起来。事后想来，她是以表示内心的哀痛和对康生、江青一伙儿的蔑视。

过了几天，我到大姐家去看望她，不料她已不住在家里了。后来探得她住在“全总后院”，被看管起来，但具体在后院何处呢？不知道。我叫小女儿炼冶前去探听。15岁的女儿找到真武庙全总的后院向人打听。那人盘问：“你是她什么人？”炼冶只说：“她是我姑姑，我要看看她。”那人又问：“谁叫你来的？”女儿只答：“我就是要看看她。”那人不知何故往一旁走去，旁边另一人用手指指方向，暗示了大姐的住处，女儿会意地立即直往里跑。大姐一见炼冶，小声问：“你怎么来的？”女儿回答说：“妈妈不放心，让我来看看。”这时，大姐又是流泪又是说：“告诉你妈可不能再来！”相隔数月，大姐回家了，我们又照常往来。

此后，大姐的病未能得到治疗，连北京也住不成了。林彪、“四人帮”强迫她下“五七干校”，走时是被人抬上火车的。她被下放到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那里正是当年我们新四军五师活动的豫鄂边区的一部分。当地许多老百姓闻风都抱着母鸡，提着鸡蛋、红枣等纷纷到“五七干校”求见，却遭到军代表百般阻挠。后来，大姐病得越发厉害，要求回京治疗，得到中央批准后，才得以住进北京医院。此时正值“文革”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人不敢去看大姐，我却经常去看她。她出院回家后，我打听到北京东四一个药店有位针灸大夫，据说不错，我又动员大姐去那里扎针。这时，她的待遇稍有改善，有车坐了，所以能隔日去一次。

一天，我的女儿王慧治（因排行第五，大姐总是叫她“小五”）从山西插队的地方扭了腰刚回到北京，也去那个药

店扎针。她在候诊时，看到一位老人在艰难地穿鞋，误认为是个老头儿，就主动上前替老人穿鞋，并一边穿一边询问老人的病情，问得很仔细。由于慧治只顾低着头帮着穿鞋，老人没看清她的脸，其实这位老人就是陈大姐。大姐反问她：“你打听这么仔细是为什么？”慧治说：“我有个姑姑和你得的是同样的病，我想打听一下，您针灸效果如果真的好，就让她也来扎针。”大姐又问：“你姑姑在哪儿，叫什么？”慧治一本正经地回答：“在全总，叫陈少敏。”这时她一抬头，大姐突然叫了声“哎呀！小五，是你呀！你妈妈和你们一家人都这么惦记着我呀！你妈早就叫我来扎针了，今天碰到你又这么照顾我，想着我……”大姐感动不已。小五回家后向我讲了这段动人的情形，我去大姐家看她时，她又回味着，激动地向我讲述起来。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真是大快人心！头一天晚上友人来相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姐。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直奔医院去看大姐，我兴奋得难以自制，轻轻地对大姐说：“大姐，江青他们几个坏蛋给抓起来了！”大姐以为我在说胡话，直打手势要我小心。我说，不是瞎说，是真的，过几天就会传达中央文件了。她先以疑虑的眼光看着我，见我确很认真，竟然举起那只还能动的手作起揖来，口中喃喃自语道：“好了，好了！”她激动得要坐起来，轻轻地问我：“小刘，可没错？”我说：“这能错！”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嘴里叨叨着：“有救了，有救了！”我想她是想说国家有救了，民族有救了。以后粉碎“四人帮”的文件正式公布后，我又去看大姐，她无限欣慰地说：“打倒了‘四人帮’，我死也瞑目了。”